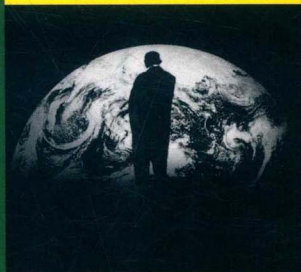




情报与反情报丛书

主编◎高金虎



Strategic Intelligence for American World Policy

战略情报之父奠基之作 美国情报工作思想源泉

战略情报

为美国世界政策服务

〔美〕谢尔曼·肯特(Sherman Kent) / 著
刘 微 肖皓元 / 译
高金虎 / 审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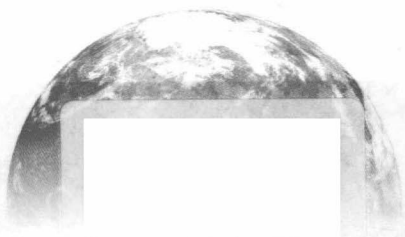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战略情报之父奠基之作 美国情报工作思想源泉

战略情报

为美国世界政策服务

〔美〕谢尔曼·肯特(Sherman Kent) / 著
刘 微 肖皓元 / 译
高金虎 / 审校



Strategic Intelligence
for American World Policy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略情报：为美国世界政策服务 / (美) 肯特著；
刘微，肖皓元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 12

书名原文：Strategic Intelligence for American
World Policy

ISBN 978-7-5155-0316-5

I. ①战… II. ①肯… ②刘… ③肖… III. ①情报工
作—研究—美国 IV. ① D771.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46392 号

COPYRIGHT, 1949,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GEOFFREY CUMBERLE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ECOND PRINTING, 1951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Copyright©2011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未经合法许可，严禁以
任何方式使用。

战略情报：为美国世界政策服务

出版人	王吉胜
主编	高金虎
作者	(美) 谢尔曼·肯特
译者	刘微 肖皓元
责任编辑	蔡传聪
开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4
字数	170 千字
版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号	ISBN 978-7-5155-0316-5
定价	39.8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编：100013
发行部	(010)84254364
编辑部	(010)84258699
总编室	(010)64228516
网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丛书总序>>>

以情报工作为研究对象，探索情报工作规律，研究改进情报工作途径的学科，在西方称为情报研究，在中国则称为军事情报学。名称不同，本质一致。

长期以来，由于情报工作本身存在着较强的隐蔽性，各个国家对情报机构的活动秘而不宣，其情报档案也不公开，从而影响了情报工作受关注的程度，情报活动成了历史研究中被遗忘的一角。

西方的情报研究，始于1949年美国学者谢尔曼·肯特《战略情报：为美国世界政策服务》一书的出版。肯特是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美国战略情报局研究分析处欧洲——非洲科的科长，战后一度回到耶鲁重执教鞭，随后担任中央情报局国家评估办公室主任。在该书中，肯特把战略情报定位为战略家制定和执行计划所必需的情报，是身居高位的文武官员保卫国家福祉必须掌握的知识。肯特开启了情报分析专业化的大门，他因而被称为“情报分析之父”。

1962年，美国兰德公司的罗伯塔·沃尔斯泰特出版了《珍珠港：警告与决策》，深刻剖析1941年驻珍珠港美军遭日军突然袭击的原因。从珍珠港事件起步，美国人一点一点地厘清了情报失误发生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开出了改进情报工作的“处方”。

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学术界在德国斯图加特召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信号情报研讨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由于相关档案的

公开，情报在二战中的作用必须重新审视，二战历史有必要重写。此后，情报研究在西方学术界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一批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战略学家、国际关系学者加入了情报研究，有力地推动了情报研究的发展。在英语世界，情报研究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与美国相比，中国的情报研究起步并不算晚。早在 2500 年前的春秋时代，中国兵圣孙子就写出了著名的《孙子兵法》，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情报学著作。孙子对战略情报要素认识的完备性、情报评估的重要性、情报谋略的微妙性、情报理论的科学性的分析，即便与 2500 年后谢尔曼·肯特的著作相比也不逊色。1943 年，军统特工郑介民出版《军事情报学》，书中所勾勒的军事情报工作体系与今日西方的情报研究体系并无本质差别。

今天，军事情报学已经列入了我国研究生与学位教育的学科门类，我们已经培养了军事情报学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甚至博士后。但情报研究在我国远未成长为一门成熟的学科。理论研究的落后，制约了我国情报与安全保密工作的发展。

中国兵圣孙子说过：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情报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进国家安全工作，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要在复杂多变的世界局势中、在尖锐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必须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地谋划保密工作，全面、深入地了解世界主要大国情报机构进行策反、渗透、心战、窃密的基本手法，掌握其情报活动的基本特点，从而有的放矢，筑起反渗透、防泄密的防火墙，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这是每一个从事国家安全和保密工作的同志的神圣使命。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策划了这套《情报与反情报丛书》。所选作品均为西方名家的情报研究经典，内容涉及情报基础理论、情报

体制、情报历史、谍报技术、反间谍、隐蔽行动、情报分析与失误、突然袭击等，涵盖了情报工作的各个领域。我们希冀，这套丛书的出版，可以推动我国的情报研究，并对改善我国国家安全工作有所裨益。

高金虎

2011年5月

于南京

再版说明>>>

第二次出版使我有机会做出一些细微的修正，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更正机会：

错误之一——我们在午夜梦回之时才会想起的那种错误——在本书初版序言中忘记提及詹姆士·P·巴克斯特校长。多诺万将军创建情报组织^①时，巴克斯特是为数不多的创建者之一，他是我们研究分析处最应感谢的人。他不仅是整个情报机构的关键人物，也是我们的第一任领导。从巴克斯特和他的顶尖参谋班子，我们首次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流的情报工作经验。在他领导之下，以及他在战争中期返回大学以后，我们都取得了许多成绩，我们无不对他充满感激之情。对于他，我想表示一份迟到而又诚挚的谢意。

谢尔曼·肯特

1950年9月1日

^① 指情报协调局和战略情报局。译注。

序言>>>

这是一本关于情报 (intelligence)^① 的书。我所说的 intelligence, 不是心理学家试图测量的某个人的理解能力, 而是战略学家制定和实施计划所必需的那种情报。正如我将描述的, 情报是高层军政人员保卫国家福祉所必须具备的知识。

关于情报有许多可以理解的神秘性, 但情报确实就是一件简单明了的事情。作为一种活动, 它是对某种特定知识的追求; 作为一种现象, 它是一种因之产生的知识。小而言之, 我们每天都在从事情报工作。当一个家庭主妇决定增加她的购物清单时, 当一个医生诊断病情时, 几乎每个人决定采取行动时, 都会做些初步的情报工作。有时这项工作是非正式的、发自本能的, 以至于不被视为情报工作, 比如, 在分类电话簿中寻找合适的修车工人。有时这项工作正式的、艰苦的、系统的, 例如在林德伯格绑架案^②中, 警官阿瑟·凯勒对涉案的梯子所做的精湛分析。但不管这

① 在英语中, intelligence 兼有“信息”、“情报”和“智慧”、“理解力”之意。译注。

② 1932年3月1日晚, 绑匪绑架了著名飞行员林德伯格 20 个月大的儿子, 并索赎金五万美元。11 天后, 小查尔斯·林德伯格的尸体被发现。两年后, 警方发现了一名犯罪嫌疑人, 纽约木匠豪普曼。他是一名非法移民, 犯有前科, 并且还有若干不利证据指向他: 在他家车库发现了部分被记下号码的赎金; 七个笔迹专家认为豪普曼的笔迹与勒索赎金纸条上的笔迹相符; 绑匪用来爬上婴儿室窗口的梯子上的木料有的来自豪普曼家附近一棵松树, 有的来自他家的地板; 有人看到他在绑架案发生的当天出现在林德伯格家附近。最有力的证据是那些赎金本身,

项工作是出于本能，还是有意识的精湛的智力活动，从本质上讲，情报工作都只是对唯一的最好答案的追求。

正如我在这本书中即将讨论的，战略情报是寻求这种有用知识的一种拓展。这种拓展体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要形容战略情报产生的知识，应使用一个比“有用”更为冷峻的词汇。你应称之为**对于国家生存来说至关重要的知识**，因此它是严峻的、高层次的。

其次，细微之处的拓展，在处理攸关国家存亡的问题时，需要对其他国家的实力和意图进行长期预测，评估其为应对我方行动计划可能做出的反应。这些问题只能交由具备专业技能的专家处理。这种专业上的拓展是相当大的。但另一方面，在寻求这种细微知识时，我们经常会遇到阻碍。这些障碍是其他国家有意设置的，克服这些障碍所使用的方法，也是常人所不尽熟悉的。这就存在着第三种拓展，即通向秘密调查领域的拓展。（据说这一阶段的情报工作最为引人注目，也是外行人过分渲染的。）

最后一个拓展就是规模的大小。战略情报产生的知识数量相当巨大，以至于战争期间需要成千上万的专业人员才能做好这项工作。和平时期，这项任务同样巨大。这就意味着情报处理需要依靠集体努力，而不是仅靠个人力量；必须有一个复杂而谨慎的劳动分工；随之就会产生人事、组织、管理和人际关系等问题，这些都是企业才拥有的特质，而不同于我们平时所见的追求真理的活动。

我所说的这种拓展尽管十分重要，但依然处于情报工作的外围，因为情报工作的中心依然是一种简单自然的获取知识的努力，

豪普曼就是因为使用这些钱才被发现的。1936年4月，豪普曼被送上电椅，但有关此事的议论并未平息。有人认为他是无辜的，有人认为是林德伯格自己或者他妻子的姐姐杀死了孩子；豪普曼的妻子安娜则至死都在呼吁还她丈夫清白。译注。

以确保行动能取得成功。我们可以说，战略情报是一种战争时期及平时国家的外交政策都必须依赖的知识。诚如沃尔特·李普曼所说，如果外交政策是共和国的盾，那么战略情报就是使盾在合适时间放在合适位置的东西。它也是准备引导长剑出鞘的东西。

在我国历史上的平时时期，情报工作的重要职能以前从未得到恰当履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情报的生产者、使用者及最终受益者——国民，对情报工作存在着一系列的错误认知，其中很多错误认知来源于情报语言的不准确，它们长期存在于各种教范中。如果我的著作中包含了一些情报行业的新词汇，如果这些词汇看起来过分地关注语义学，我愿对此进行辩护。正如约翰·洛克所说，“对世界上已经通用的一些字眼和名词加以挑剔，可能会被指责为一种不恰当的非难，但是当旧名词容易使人陷入误区时，提出一些新名词也许不会被认为是不妥当的……”

这本书的写作方案是简明的，主要基于三个独立的方面。情报人员通常使用这些词汇谈论情报工作。

第一部分，我把情报当做一种知识（“关于哥伦比亚局势，你有什么情报？”）。这部分的章节阐述情报广泛多样的内容。

第二部分，我把情报当做生产知识的组织（“情报能向执行者准确地提供其所需信息”）。这些章节阐述中央情报机构和部门情报组织的组织和管理问题。

第三部分，我把情报当做情报组织所从事的活动（“计划背后的情报工作一定是紧张的”）。这些章节我会讨论情报工作所包括的内容，以及我认为其特有的问题。

本书付梓完稿之际，我由衷地感谢那些对书中内容做出贡献的朋友、同事以及辩论者。事实上，书中所列问题都是我和情报战线

的同志们长期讨论过的。我特别感谢我在战略情报局工作时的领导和同事：多诺万将军、马格鲁德将军、威廉·L. 兰格、爱德华·S. 梅森、鲁道夫·温纳克、唐纳德·麦凯、理查德·哈茨霍恩、阿瑟·罗宾逊及许多其他同事。夏洛特·鲍曼、约翰·索耶、罗伯特·迈纳、贝弗利·鲍伊、伯纳德·布罗迪对初稿内容进行多次阅读、编辑、改正、提出问题和建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正是他们的帮助，才使本书得以顺利完成。感谢我的前任领导阿尔弗雷德·麦科马克，他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感谢阿诺德·沃尔弗斯、威尔莫·肯达尔、珀西·科比特、惠特尼·格里斯沃尔德，他们阅读了原稿并提出了很多建议。

我曾有幸以文职教官身份在国家战争学院执教，对于国家战争学院的领导、同事和第一批学员，我表示深深的谢意。学院的氛围、同事的友善、富有启发的讨论都使我受益匪浅。不论哈里·W. 希尔海军中将、阿尔弗雷德·M. 格仑瑟少将、杜鲁门·兰登少将、乔治·凯南先生对本书内容赞同与否，我都对他们表示谢意。感谢廷布莱克准将和皮彻准将，沃纳上校、斯威尼上校、特威蒂上校、沃尔芬巴杰上校、赫特福德上校、穆尔上校，以及埃文森上尉、韦林斯上尉。

感谢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正是他们的研究基金，使我著作的大部分内容得以完成。如同所有的古根汉姆学者（Guggenheim Fellows）^①，我对这个研究机构表示最诚挚的谢意，感谢其慷慨而富有远见的创建者，感谢友善而极具效率的秘书长亨利·A. 莫。

^① 古根海姆学者奖由美国国会议员西蒙·古根海姆及妻子于1925年设立，主要为世界各地的杰出学者、艺术工作者等提供奖金以支持其继续发展探索，涵盖自然、人文社会科学和创造性的艺术领域，不受年龄、国籍、肤色和种族限制。译注。

感谢乔治·S·佩蒂，从他的《美国秘密情报工作的未来》（1946年，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这一战略情报文献的开山之作中，我获得了无数灵感。尽管我发现我与他的很多观点相左，但所有的情报工作人员，包括我自己，都非常感激他将自身战争经历迅速系统阐述并出版于世。

感谢我任职的耶鲁大学和历史系，他们在我休假以后又给了我整整一年的学术时间，使我得以专心从事本书的写作。

最后，我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社长达图斯·史密斯对本书的兴趣及高见。

出自沃尔特·李普曼《公共舆论》一书的引文已得到出版商麦克米伦公司的惠允。

谢尔曼·肯特

1948年10月1日

于耶鲁大学历史系

目录>>>

第一部分 情报是知识

第一章 情报是知识	3
第二章 客观内容（一）：基本描述类战略情报	10
第三章 客观内容（二）：动态报告类战略情报	26
第四章 客观内容（三）：预测评估类战略情报	34

第二部分 情报是组织

第五章 情报是组织	57
第六章 中央情报组织	64
第七章 部门情报组织	84
第八章 部门情报组织：来自经验的 10 个训诫	94

第三部分 情报是活动

第九章 情报是活动	123
-----------------	-----

第十章 情报工作方法的特别问题	130
第十一章 情报生产者和情报用户	148
附录：情报种类	169
专有名词译名对照表	182
译后记：谢尔曼·肯特与美国的情报研究.....	184

第一部分

情报是知识



情报是知识

情报就是知识。如果它不能包含所有的知识，也至少包含着数量惊人的知识。本书探讨的只是这些知识的一小部分，却可能是最重要的。这小部分知识就是情报界所熟知的“高层次对外积极情报”。这个短语是我们国家必须掌握的有关其他国家知识的简称，其目的是确保我们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制定计划和行动方案时，不会因为无知而使事业遭受损失、行动蒙受失败。它是我国制定针对其他国家的高层次国家政策的依据和基础。

请注意我们所排除的内容。首先，它并不包括有关我们国内的知识。对外积极情报在目的、范围和内容方面是完全“对外的”，它不涉及美国领土和属地内发生的情况。其次，它也不包括所有警察职能方面的知识。短语中“积极”这个词意味着我们探讨的情报不是所谓的“反情报”和反间谍，也不是任何旨在揭露叛国者和外国渗透特工的情报。“高层次”这个词意味着战役情报、战术情报及战斗中小规模军事单位所使用的战斗情报不包含在内。排除上述